

# 經行記箋注

## 序 言

當我國唐朝建立起來的時候，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也出現於亞洲的西部，這兩個大國在公元七、八世紀時交往非常密切。據史書所載，從公元 651 年至 798 年之間，大食遣使來華的，就有三十六次之多。唐肅宗上元元年（760 年）在揚州居住的大食人和波斯人至少已有好幾千人。玄宗天寶以來，“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，……安居不欲歸，……有田宅者……凡得四千人。”（《通鑑》卷 232 貞元三年條）在這四千人之中，阿拉伯人一定不少。可見當時兩國人民在經濟文化上的交流，已相當頻繁。

唐玄宗天寶十載（公元 751 年，回曆紀元〔Hijira 黑蚩拉〕133 年），唐將高仙芝和石國發生了武裝衝突。石國兵敗，乞援於大食。高仙芝率軍深入，到了怛邏斯城 Aulie Ata，就“與大食相遇，相持五日，葛邏祿部衆叛，與大食夾攻唐軍，仙芝大敗，士卒死亡略盡，所餘才數千人，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，道路阻隘，拔汗那部衆在前，人畜塞路，嗣業前驅，奪大挺擊之，人馬俱斃，仙芝乃得過，將士相失……（李嗣業和段秀實）留拒追兵，收散卒，得俱免。”（《通鑑》卷 216 天寶十載條）這就是怛邏斯一役的簡單經過。

怛邏斯之戰的影響是很廣泛的，它的影響最突出的首先是我國造紙術的西傳。世界上首先用破布、植物纖維來造紙的，衆所周知是中國人，古代埃及人的紙草紙沒有經過化學變化，質地脆弱，不能算做正式的紙。這個真正的“造紙工業爲中國之專利，自此

(怛邏斯)役以後，大食人把中國俘虜帶至康國 (Samarkand)，造紙之術由是傳布於回教諸國而流傳至西方……此物一興，遂使埃及之草紙及皮紙一概消滅……大地一切國家之人，皆利賴之。”(《西突厥史料》中譯本頁 274) 過去西方人認為阿拉伯人學會造紙術是在 704 年，繼經加拉拔色克 (Karabecek) 指其錯誤，現在一致認為 751 年 (Hoernle: Who was the Inventor of Rag Paper? J. R. A. S. 1903, P. 663—684)。當造紙術西傳的時候，不僅康國、大馬色 (Damascus) 有了造紙場所，波斯也在 793 年開始造紙，巴格達在 793—794 年間也設立造紙工場，此後埃及、西班牙、法國、意大利、德國、英國都先後受了中國的影響，直到十八世紀末年，歐洲各國造紙時浸料與擦取完全用手工，和中國的老法子並沒有兩樣 (J. C. Oswald: A History of Printing, Chapter XXV, paper)。英國李約瑟說：“中國的發明曾為歐洲的文藝復興鋪平了道路。”(《文物參考資料》1950 年第一至第六期彙編第四頁) 這也是指造紙術西傳而言。

《經行記》的作者杜環是杜佑(735—812年)的族子。他是高仙芝兵敗於怛邏斯時給大食人俘去二萬個俘虜中的一個。杜環也作杜還、杜瑗，還與環同，關於杜環的西行，杜佑曾有以下的記述：

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，天寶十年至西海。寶應初(762年)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，著《經行記》。(《通典》卷 191《邊防典》七)  
唐代杜氏“凡五房：一京兆杜氏，二杜陵杜氏，三襄陽杜氏，四涇水杜氏，五濮陽杜氏。”杜佑為襄陽杜氏(馬永卿：《嬾真子》卷 1 杜氏族系條)，而自稱為杜陵系統(《全唐文》卷 477《郊居記》)。史書不記杜環生平，孫詒讓《唐杜氏考》(《籀齋述林》卷 1 第 11 頁)、鄭

鶴聲《杜佑家世系統表》(《杜佑年譜》頁13—14)并闕而不書,其實,也無法深考。杜環的《經行記》是一部久佚的書,今見之於《通典》的僅有一千五百十一字,它能够翔實地反映當時中亞各國和大食、拂菻、吉國的情況,又提到了錫蘭、可薩突厥、摩隣國。所以後人對它的評價是很高的。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通志》、《通考》中的轉載不用說了,單就它所記的伊斯蘭教教法來說便以下的記錄,如:

(大食)一名亞俱羅,其大食王號暮門,都此處。其……女子出門,必擁蔽其面,無問貴賤。一日五時禮天,食肉作齋,以殺生爲功德,繫銀帶,佩銀刀,斷飲酒,禁音樂,人相爭者,不至毆擊。又有禮堂容數萬人,每七日,王出禮拜,登高座爲衆說法曰:“人生甚難,天道不易,姦非劫竊,細行謾言,安己危人,欺貧虐賤,有一於此,罪莫大焉。凡有征戰,爲敵所戮,必得生天,殺其敵人,獲福無量。”率土稟化,從之如流,法唯從寬,葬唯從儉。(《通典》卷193《邊防典》引)

其大食法者,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,縱有微過,不至相累。不食猪狗驢馬等肉,不拜國王父母之尊,不信鬼神,(原誤“不”爲“大”,今改)祀天而已。其俗,每七日一假,不買賣,不出納,唯飲酒、謔浪終日。(《通典》卷193《邊防典》引)

從此(末祿)至西海以來,大食、波斯參雜居止,其俗禮天,不食自死肉及宿肉,以香油塗髮。(同上)

這是關於伊斯蘭教很簡要、正確而得體的最早紀錄。陳垣先生說:“中國典籍記回教事最早而又最正確者,當推杜佑《通典》,佑之族子環……居西域十二年,(歸)……作《經行記》……《通典》常引用之……。”(《回回教入中國史略》,《東方雜誌》第二十五卷一號)白壽彝先生說:“(杜環對)伊斯蘭教義有相當正確的知識,把他所知道的教義記在《經行記》里,遂成了伊斯蘭教義之最早的中文記

錄，這在中國伊斯蘭史上也是一件大書特書的事。”（《中國伊斯蘭史綱要參考資料》頁 127）

不止如此，《經行記》里還有很寶貴的記載：

綾絹機杼，金銀匠，畫匠，漢匠起作畫者，京兆人樊淑、劉泚，織絡者河東人樂隱、呂禮。（《通典》卷 193《邊防典》引）

這段文字雖然非常簡略，但是它說明中國綾絹工人、金銀業工人、畫家的西傳。換句話說，它標明唐代生產技術的西漸，並保留了好幾個手工業工人的姓名。遠在秦漢時代，我國絲織品已流行於西方，那時歐洲人是用黃金和它比價的。南北朝末期，東羅馬從中國傳入蠶種，開始了養蠶。到了唐代，我國紡織機械、技術的西傳，發展了阿拉伯人的手工業，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這為宋元時代巴格達、摩索爾紡織業創造了很有利的條件。《經行記》這段記載有力地說明但羅斯之戰前後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一些情況。

杭州丁謙很早就愛好這部《經行記》，他從《通典》中之所見，寫出了《經行記考證》一書（《浙江圖書館叢書》本）。王靜安從明朝嘉靖年間李元陽本的《通典》中將散見的《經行記》輯為一書（《王靜安遺書》外編，《古行記校錄》），不過沒有附以注釋，且不依《通典》的次序。1866 年，英國的亨利·玉爾（Henry Yule）嘗譯《經行記》中拂菻國部分於 Cathay & the Way Thither, Vol. I, P. 235。1885 年，德國夏德（Hirth）也將《經行記》拂菻國部分譯為英文，見 China & Roman Orient, P. 95。1903 年，法國沙畹出版《西突厥史料》時，曾在其第四篇中引用《經行記》數處。1911 年，夏德復和柔克義（Rockhill）將《經行記》拂菻部分轉載於《趙汝适》（Chau-Ju-Kua）p. 104。法國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在《交廣印度兩道考》裏引用了《經行記》之外，並大談其“拂菻”對音。1929 年在《通報》

上發表《黑衣大食都城之漢匠》，討論《經行記》大食條中的一段。日本方面桑原隲藏在《蒲壽庚考》裏重視杜環作品之外，白鳥庫吉在1904年將《經行記》中拂菻國、摩隣國及大食法、大秦法、尋尋法等全部引用，並且說它是“關於拂菻方面唐代之第一史料”。（《大秦國及拂菻國考》，《塞外史地論文譯叢》第一輯）石田幹之助在他的《中西文化之交流》和《長安の春》（頁207）裏都談到了造紙術西傳與杜環活動。去年，前島信次發表《怛邏斯戰考》，討論這次戰爭的成因（《史學》第三十二卷一號）。我國學人張星烺、馮承鈞、向達、白壽彝等先生都重視杜環的著作，1960年岑仲勉先生還說過這樣的話：

杜君卿（佑）與環既同族，不將《經行記》全部納入《西戎典》，而使人莫窺全豹，是亦天壤間一恨事。（1960年六月二日給作者的信）

其見稱於國內、國外學者又如此。

我在年青的時候就喜歡這個《經行記》，友人李叔和先生多次鼓勵我爲之作注。解放前，我在福建協和大學工作的時候，課餘搜集資料寫成了《杜環經行記箋證》，繼經傅衣凌先生校閱，出版於福建，但印數不多。全國解放後，我深悟前書倉卒之失，便下決心全部重新整理，得到了岑仲勉先生的大力支持，岑先生和我神交二十年，彼此雖未識面，而最近幾年論學書疏往來不絕，他對我的教誡諄諄，情見乎辭。遺憾的是，當我整理改寫工作全部終了的時候，岑先生已經辭世，使我失去就教改正的機會，撫卷嘆息，不禁悵然自失者久之。

這裏還必須附帶說明的是：（1）這次整理是依據《通典》所引《經行記》原文先後順序排列，參考《通志》、《通考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引文、王靜安遺書外編《古行記校錄》（海寧王氏校印本）來校注，並稱王靜安《古行記校錄》本爲王

靜安校本。各本原來俱乏分國標題，今增補之，以清眉目。(2)杜環所記里程，正確折算，很有困難，世稱玄奘之二百五十里與赤道一度相當 (Richthefen: China. Vol. I, P. 542)，玄奘之一里約當 440 公尺，亨利·玉爾主張玄奘百里，解為一日行程 (J. R. S. 1872, P. 92)。掘謙德主張玄奘里程換算率：在平地五里為一英里，在山地以六里為一英里 (《解說西域記》凡例，見《西北古地研究》頁 56 引)。足立喜六認為玄奘一里等於 0.17 哩(二十四米達)或 0.15 哩(《法顯傳攷證》中譯本頁 104—105)。桑原隲藏說：“唐里距離較今稍短。”(《續史的研究》，《西北古地研究》頁 56 引)杜環之里程換算，也只能說是如此而已。

最後，我感謝中華書局編輯部古代史組負責同志給我的加工和幫助。

張一純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山西大學。

# 目 錄

## 序言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拔汗那國 .....        | 1  |
| 二、康國 .....          | 6  |
| 三、師子國 .....         | 10 |
| 四、拂菻國 .....         | 12 |
| 五、摩隣國 .....         | 19 |
| 六、大食法、大秦法、尋尋法 ..... | 21 |
| 七、波斯國 .....         | 24 |
| 八、石國 .....          | 25 |
| 九、碎葉國 .....         | 28 |
| 一〇、大食國 .....        | 45 |
| 一一、末祿國 .....        | 57 |
| 一二、苦國 .....         | 62 |

## 一、拔汗那國

### 拔汗那國

公元前一、二世紀時，拔汗那（Ferghanah）之地爲大宛國，爲一伊蘭語系國家，人口達三十萬，經濟以農耕兼牧畜爲主，並產汗血馬著名。南北朝時代稱破洛那，《隋書》卷83《西域傳》、《北史》卷97《西域傳》俱作鑠汗，並云“西北去石國五百里”，“(卽)古渠搜國”(而《北史》同卷又作破洛那、洛那國)。《西域記》作怖捍（卷1）。慧超《往五天竺國傳》作跋賀訖，藤田豐八《箋釋》“訖”當爲“那”。《通典》卷192《邊防典》云“撥汗一名判汗”，《通鑑》卷211開元三年條稱：開元三年（715年）拔汗那爲大食等所侵，其王奔安西求救，張孝嵩發兵援之，大捷，大食等國請降。《舊唐書》卷97《郭元振傳》稱唐“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馬……拔汗那胡不勝侵擾。”唐玄宗天寶三載（744年）改其國號爲寧遠（《新唐書》卷221下《西域傳》）。今錫爾河上游費爾干盆地卽其地。

在但邏斯南千里，東隔山。

《西域記》云：“國周四千餘里，山周四境。”（卷1）

天山在其東。但邏斯詳見《碎葉國》。

《太平寰宇記》卷186引誤“怛”爲“恒”，“千里”作“千餘里”，均不確。

去疎勒二千餘里，西去石國千餘里。

疎勒，唐太宗貞觀中內附，唐置疎勒都督府（《唐會要》卷 73 安西都護府條），故治在今新疆喀什噶爾。其與拔汗那距離烏里約七百六十里。《西域記》謂“（赫時，即石國）東南千餘里至怛捍”（卷 1），是石國在拔汗那西北，與上述《隋書·西域傳》合，惟《隋書·西域傳》所載里距有誤。

《通典》卷 192 引作“西去本國千餘里”，“本”字誤，今從《太平寰宇記》卷 186、《通志》卷 196 引改。而《寰宇記》引奪“餘”字。

城有數十，兵有數萬。

《新唐書》卷 221 下《西域傳》：“拔汗那……去京師八千里，居西隄城，在眞珠河之北，有大城六，小城百……。”（眞珠河，見《石國》）西隄，張星烺謂不可考（《中西交通史料匯編》第五冊頁 155）。沙畹云：“西隄應是 Akhsikath 之省譯，考 Edrisi 地誌：拔汗那除鄉村外，有大城七，其重要者曰 Akhsikath，城在 Chach (Sir Daria) 河北（《西突厥史料》中譯本頁 137）。《新唐書》同卷又稱“以渴塞城爲休循州”。此休循州 Kasan 爲拔汗那首府，一要城也（《西突厥史料》中譯本頁 248 引 Aboulféda 地誌）。張星烺又謂：“可汗那 (Kokana) 爲拔汗那境內一城，約在……錫耳河南岸。《冊府元龜》卷 971 所載開元二十一年三月及十二月可汗那王易米施遣使來朝事，即此城也。”（《中西交通史料匯編》第五冊頁 157）石汗那或曰斡汗那，見《新唐書》卷 221 下《西域傳》，沙畹疑可汗那係石汗那之誤（《西突厥史料》中譯本頁 314）。居 Kafirnagan 上流，今 Denon（馮承鈞：《西域地名》頁 61）。張說非。毗爾 (Beal) 比石汗那於 Hissār，恐不確（岑仲勉：《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》頁 149）。

《太平寰宇記》卷 186 引作：“戶有數千，兵有數萬”，近似，今從《通典》卷 193 引。

### 大唐天寶三年，嫁和義公主於此。

開元二十七年（739 年）唐將蓋嘉運破吐火仙時（詳見《碎葉國》），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與疎勒鎮守使夫蒙靈督共攻怛邏斯城，斬“黑姓可汗”爾微特勤（勒）及弟撥斯（唐將），收散落百姓數萬，悉付阿悉爛達干以歸（《冊府元龜》卷 358）。後改其國號爲寧遠，並以和義公主嫁之。《冊府元龜》卷 971 載有 739、741、745、749、751 等年阿悉爛達干遣使入唐。《新唐書》卷 221 下《西域傳》：“改其國號寧遠，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寶，又封宗室女爲和義公主，降之。”《通鑑》卷 215 天寶三載條：“十二月癸卯（十四），以宗室女爲和義公主嫁寧遠奉化王阿悉爛達干……。”（《唐會要》卷 6 和番公主條所記同之）據《冊府元龜》卷 979 所載，此和義公主爲玄宗“四從弟前河南府告成縣令參第四女”。

和義公主嫁拔汗那一事，依上列諸書考之，其在天寶三年無疑，《通典》卷 193、《通志》卷 196、《通考》卷 337、《太平寰宇記》卷 186 引文俱作十年，今改之。時杜環尚未被俘，所記容易失實，或當時傳寫之誤，若謂此乃怛邏斯戰後事，恐杜環時已被俘，不得見矣。《通考》卷 338 又作天寶三年，《寰宇記》卷 186 引“唐”上無“大”字，“此”下衍“國中”二字。

### 國土有波羅林，林下有毬場。

《新唐書》卷 221 上《西域傳》：“摩揭陀……貞觀二十一年（647 年）……獻波羅樹，樹類白楊……。”所謂波羅林者卽此。所謂毬場，可能爲波羅毬場。

向達先生說：“波羅毬爲一種馬上打毬之戲，發源於波斯，其後西行，傳至君士坦丁堡，東來傳至土耳其斯坦……傳入中國、印度諸地。日本、高麗亦有此戲，則又得自中國。……（《杜環經行記》）所謂毬場，必爲波羅毬場無疑。……波羅毬傳入中國，當始於唐太宗時。”“波羅毬傳入中國，歷唐、宋、元、明而不衰……唐代之波羅毬大約直接從西域傳來，是以猶有波斯舊音……。”（《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》頁80—82）“波羅毬爲一種馬上毬戲，亦有步打者。打毬時並須奏樂，《羯鼓錄》諸宮曲太簇商有《打毬樂》，大約卽爲此戲時之所奏。”（同上頁75）韓振華以爲毬用波羅木卽菩提樹製，岑仲勉先生認爲菩提樹非中亞原產，馬毬（波羅毬）以木抑韋爲之，亦成疑問……其祖語應爲古伊（蘭）文 Vareta 圓毬也（《隋唐史》卷下頁646）。陰法魯謂：“波羅（Polo）一詞源出於藏語”，說波羅毬戲發源於西藏（《唐代西藏馬毬傳入長安》，《歷史研究》1959年六月號）。其實西藏文波羅一詞爲外來語，係從西方傳入，聞陰氏最近已放棄此說。關於唐代打毬，詳見《末祿國》。

“國土”，王靜安校本作“國中”，《通典》卷193作“國主”，張星烺謂他本作“主”誤，當作“土”，蓋從《太平寰宇記》卷186、《通考》卷339引，今從之。王靜安校本又謂“波”原誤爲“皮”，而今本《通典》卷193引作“波”字不誤。

又有野鼠，遍於山谷。

《太平廣記》卷440鼠條：“西域有鼠，大如狗，中者如兔，小者如常。大鼠頭悉已白……釋道安昔至西方，親見如此。”

王靜安校本據《寰宇記》引增“野”字，而今本仍有“野”字。“遍於山谷”，《太平寰宇記》卷181引作“滿山谷偏”，《通考》卷337

引作“遍滿山谷”，《通志》卷 196 “山”作“于”字，王靜安校本作“遍滿山谷”，今從《通典》卷 193 引。

土宜蒲萄、菴羅(音諧)羅果、香棗、桃、李。

蒲萄，詳見《碎葉國》。

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：“菴羅，梵音二合者也……華言清淨……菴羅果，樹生，若林檎而極大……西洛甚多，梨之類也……按《一統志》云：菴羅果俗名香蓋，乃果中極品，種出西域，亦柰類也。……食之止渴。……”(卷 30 果部)

香棗，《新唐書》卷 40《地理志》：“伊州伊吾郡（今新疆哈密）……土貢香棗……。”柳貫打《棗譜》云：“香棗出哈密”(《古今圖書集成·草木典》卷 223 棗部引)。

桃，始見於《詩經·周南》“桃之夭夭”、《禮記·月令、內則、玉藻》。

李，始見於《詩經·召南》“何彼襍矣”、《禮記·內則、玉藻》。

張星烺云：“中國桃種輸入伊蘭，約當耶穌紀元前一二世紀，由波斯而亞美尼亞、而希臘、而羅馬……玄奘《西域記》卷四，記中國桃之傳植印度彭甲伯（Panjab）。……桃梨之傳植印度與桃杏之傳植羅馬，約同時也。”（《中西交通史料匯編》第四冊頁 195—196）

《太平寰宇記》卷 186、《通志》卷 196、《通考》卷 339 引俱無“土”字，衍“偏”字，今從《通典》卷 193 引，而《通典》誤“李”字爲“季”字。

從此至西海，盡居土室，衣羊皮疊布，男子婦人皆著韉，婦人不飾鉛粉，以青黛塗眼而已。

白鳥庫吉《條支國考》：“四海一語是泛指中國四裔有四大海，前漢時代……青海被稱爲西海……張騫使西域……裏海、波

斯灣，併稱之爲西海，後漢又稱印度洋爲西海，一至唐代。杜環《經行記》中又記地中海爲西海……故未能專指一海……且某一時代一呼西海之後，即使往後發見更西海水，呼之爲西海，但昔日所呼之西海，其名仍未改變。”（《塞外史地論文譯叢》第一輯）此說可信。

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卷 16：“波斯青黛亦是外國藍靛花，蓋原產印度。”疊布，見《末祿國》。

《通志》卷 196 引“至”作“之”字，“不”上“人”字作“女”字。《通典》卷 193 引“此”下有“國”字，“鉛粉”作“金粉”。王靜安校本據《太平寰宇記》卷 186 引改，今從之。

## 二、康 國

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，一名薩末建。

康國，確爲撒馬爾罕 (Samarkand)，其地在今中亞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，錫爾河流域。Samar 意卽肥，Kand 意卽國。耶律楚材《西游錄》：“以土地肥饒故名。”或云華言太陽城，岑仲勉先生謂 Kand 卽康國所由名（《隋唐史》卷下頁 243）

《西域記》云：“（康）東南至弭秣賀（卽米國），”（卷 1）《太平寰宇記》卷 183 云“康在米西北”，《隋書》卷 83《西域傳》“米國西北去康國百里”，《新唐書》卷 221 下《西域傳》“（康）東南屬米百里”，而杜環作西南，誤。米國或曰“彌末”、“弭秣賀”，湯瑪揭克 (Tomaschek) 斷定米國卽今之 Ğuma-a-Bazar。沙畹云米國卽 Maimargh（《西突厥史料》中譯本頁 134）。《隋書·西域傳》、《新唐書·西域傳》俱云米“北百里距康”，百里誤；《通

志》卷 196 引作“二百里”，誤。杜環謂其相去三百餘里。以里距按之近是。

康國，元魏時稱悉萬斤（《魏書》卷 4 上《太武帝本紀》、卷 5《文成帝本紀》）。《西域記》作颯秣建（卷 1），《隋書·西域傳》作康國，《新唐書·西域傳》稱康國一曰薩末健，此爲伊蘭語。《北史》卷 97《西域傳》悉萬斤與康國各有傳，而康國傳又本之《隋書》。撒馬爾干之異譯又作尋思干、薛迷思干、撒麻兒干、撒馬兒罕，此爲阿拉伯語。張星烺云：“薩馬兒罕城甚古，波斯祆教聖經 Zend-Avesta 中已有之。……城市富庶，伊蘭人稱此爲 Sogdo，由是希臘、羅馬著作家稱之曰 Sogdiana。……亞歷山大王嘗至 Maracanda，後人皆信此 Maracanda 爲薩馬兒罕也。……回教著作家皆記薩馬兒罕爲 Sogd 之都城。”（《中西交通史料匯編》第五冊頁 7）

《新唐書》卷 221 下《西域傳》：“（康）在那密水南，大城三十，小堡三百，君姓溫，本月氏人，始居祁連北昭武城，爲突厥所破，稍南依葱嶺，卽有其地。枝庶分王……世謂九姓，皆氏昭武……。”那密水卽《隋書·西域傳》之薩寶水（Zarafshan，《西突厥史料》中譯本頁 123—124）。白鳥庫吉說九姓爲月氏種說法，《新、舊唐書·西域傳》承用《隋書·西域傳》之文。九姓胡在西漢時實役屬於康居，與南方之月氏各別爲國（《塞外史地論文譯叢》第二輯頁 421—422）。又說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之康居爲突厥種，非粟特人（《康居粟特考》頁 16）。《元史譯文證補》卷 24 曾揭高車卽康居之疑，岑仲勉先生申其可信，並結合《闕特勤碑》文認爲康居——高車——康里之同一，已成爲定案（《突厥集史》下冊頁 1119 至 1120）。岑氏又謂：“康居爲北方之突

厥民族，當西漢時勢力南伸於中亞，其後退回北方。別有粟特人所建之撒馬爾干，漢譯爲康國，自《晉書》起，因康字相同，遂混而爲一，今中外學人沿誤者仍甚多。”（《隋唐史》卷上頁48）《西域記》：“（颯秣建國）兵馬強盛，多是赭羯。赭羯之人，其性勇烈，視死如歸，戰無前敵。”（卷1）《新唐書·西域傳》所謂兵彊者即此（赭羯，似非柘折）。712年大食將領屈底波兵圍康國，康國王烏勒伽求救於石國拔汗那國國王與（突厥）可汗，可汗命其子闕特勤統精兵往援，然救兵爲大食所滅，而康國降於大食（《西突厥史料》中譯本頁265）。德宗貞元十七年（801年），吐蕃與康國兵出現於南詔（《新唐書》卷222上《南詔傳》）。據《冊府元龜》所載：康國在643年、645年送方物（卷970、卷985）。696年、698年兩封其王（卷964）。718年、719年、724年、731年、738年、744年、750年、751年、752年、755年均遣使入唐（卷971、卷999、卷964）。與唐室交往之盛，於此可見。

《通典》卷193引薩末建作薩未建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186引“康”字下衍“居”字，“薩末建”作“薩米建”，王靜安校本作“薩末建”。

土沃人富，國小，有神祠名祆。

隋韋節《西蕃記》：“康國人並善賈，男年五歲，則令學書，少解則遣學賈，以得利多爲善。”（《通典》卷193《邊防典》引）當時在西亞貿遷絲物者，要以康居人爲衆（《西突厥史料》中譯本頁209），西方學者所稱之“絲路”即以康國爲據點之一。高仙芝兵敗之後，被虜西行者傳造紙術，康國設立造紙場所，而以造紙著稱。《新唐書》卷221下《西域傳》：“（康）善商賈，好利，丈

夫年二十去傍國，利所在，無不至。”“康國人常往來於今撒馬兒罕及庫倫之間”（馮承鈞：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》頁152）。致富之道在乎此。其國人東徙，沿途居停之地有高昌、沙州、柳城等處，沙州一隅爲數尤夥，有近出墓志及敦煌遺籍可證（向達：《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》頁30—31）。

《西域記》云：“異方寶貨，多聚此國，土地沃壤，稼穡備植，林樹蓊鬱，華果滋茂，多出善馬。”又云：“國周千六七百里，東西長，南北狹，國大。”（卷1）慧超《往五天竺國傳》：“爲國狹小，兵馬不多，而能自護……。”（《敦煌遺書》第一集）杜環亦言其國小，或驟見其狹耳。

“祆”，《通典》卷193引作“拔”字。白鳥庫吉云：“大概此拔字卽波斯語之寶座。”（《康居粟特考》頁41）此不慎而強爲之辭。王靜安校本云：“拔當作祆，《隋書·康國傳》：有胡律，置於祆祠，罰則取而斷之。”祆教創始年代，史無確紀，創教人蘇魯阿士德約生於公元前十五、十六世紀。其教以火、以光代表善神而崇拜之。又稱拜火教或火祆教。波斯桑珊王朝定之爲國教後，始大行於西域，其傳入中國蓋在516—519年之間，卽南梁、北魏間。及大食滅波斯占有中亞，教徒之移住東方者遂多。會昌五年（845年），唐武宗毀佛受株累。五代兩宋，祆祠猶有存者（陳垣：《火祆教入中國考》，《北京大學國學季刊》第一卷第一號）。《新唐書》卷221下《西域傳》：“（康國）以十二月爲歲首，尚浮圖法，祀祆神……。”足證其國並奉佛教、祆教（《西突厥史料》中譯本頁125）。《慈恩傳》謂其王及百姓不信佛法，以事火爲道，客僧投者，諸胡以火燒逐，不許停住（卷2）。慧超《往五天竺國傳》：（康國）等“六國總事火祆，不識佛法”，此皆